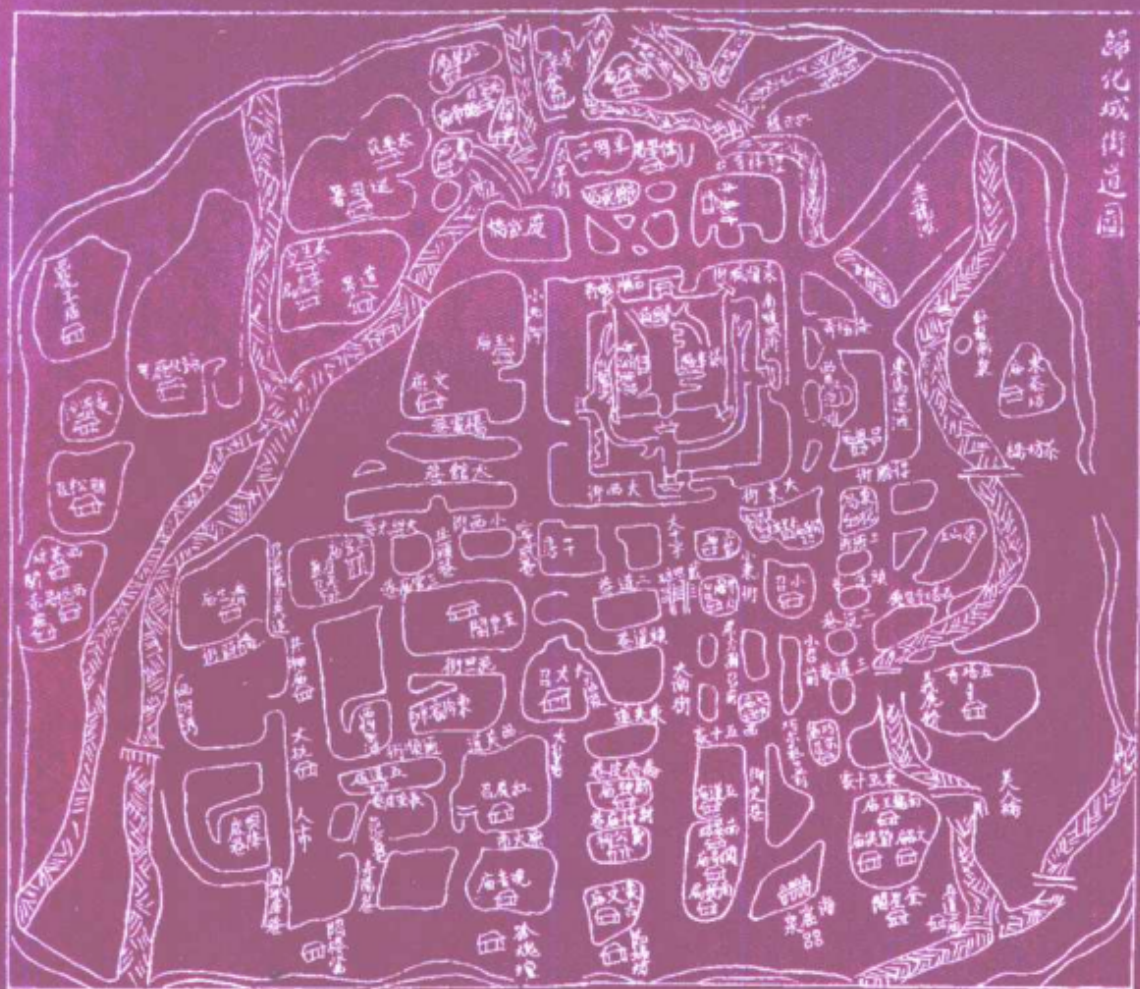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 世界建筑杂志社 主办

建筑史论文集

第14辑

主编 张复合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责任编辑：李彦华

封面设计：张复合 葛占基

封面题字：黄报青

封面图：归化城街道图

采自（清）《归化城厅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ISBN 7-302-01190-7



9 787302 011903 >

定价：28.00 元

535

TG-09
Q73

建筑史论文集

第14辑

TREATISES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Vol. 14

主编 张复合
Zhang Fuhe



A09821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专门发表建筑史研究论文之学术丛书,由清华大学创办于1964年。本书为第14辑,收入论文26篇,内容涉及古代城市史研究、古代建筑史研究、近现代建筑史研究、建筑理论方法及方法论、历史建筑保护等诸多方面。

2001年适逢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本文集为此编发了缅怀梁思成先生严谨治学、开创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事业、致力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纪念文章,以及回顾清华大学校园建设等论文。

关于皇家工程销算流程、客家土楼夯筑技术、平推铍对建筑技术的影响、古戏台台基之变迁等论文,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从法令规制中看东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首次从具体建筑形态入手,对北京近代商业空间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南京原外交部办公处建筑设计引发的思考,则有助于探究建筑活动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

本文集反映了近年来关于建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本书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人员吸取建筑历史经验、从事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指导作用,对文物保护单位 and 开发单位保护与再利用历史建筑、开发历史地段具有参考价值。本书既可作为建筑历史研究资料、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历史理论教学教材,又可作为了解建筑演进和城市变迁的实用指南。

书 名: 建筑史论文集 第14辑

作 者: 张复合 主编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市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443千字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1190-7/TU·158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28.00元

严谨学风 精品意识

——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楼庆西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 100 周年,建筑学院决定编辑出版《梁思成全集》。在参加这项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又重读了部分梁先生的著作与论文。梁先生为我们留下的近百万字的著作,无疑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它们集中体现了梁先生毕生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梁先生那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和他对科学事业百折不挠的求知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使他们终身难忘与受益。

作为梁先生的学生与助手,我有幸有较长的时间跟随梁先生学习和工作,能够较多地得到梁先生的教诲,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梁先生那贯彻始终的严谨学风和精品意识。

—

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求学时,梁先生就立下志愿要研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建筑历史,但真正集中精力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工作还是从 1931 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这时,梁先生清楚地知道在一些古老的西方国家早就发展了建筑历史科学,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中国,真正把建筑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还刚刚起步,与世界相比,这种差距是何等巨大。

所以梁先生一开始就将他学到和了解到的近代研究建筑历史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中国建筑的研究上,一开始就从实际建筑的调查做起,在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的分析与研究。

从 1931 年到 1943 年梁先生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的 12 年中,梁先生与刘敦桢先生和营造学社其他同仁,组成总共不到 10 人的集体,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 15 个省、200 余个县,测绘、摄影、分析、研究了 2000 余项古建筑与文物,发表了 70 余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专集。对于这样一项对中国古代建筑整体的庞大研究工作来说,12 年的时间是不长的,而且其中还经历着条件极其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梁先生在工作一开始就坚持了严谨的学风与高标准的要求,一开始就树立起一种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达到世界水平的精品意识。

调查古建筑的基础工作是测绘,梁先生对测绘工作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他要求对古建筑

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进行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至今,当我们翻出六七十年前的测绘图稿,看上去还是显得那么清楚与详尽(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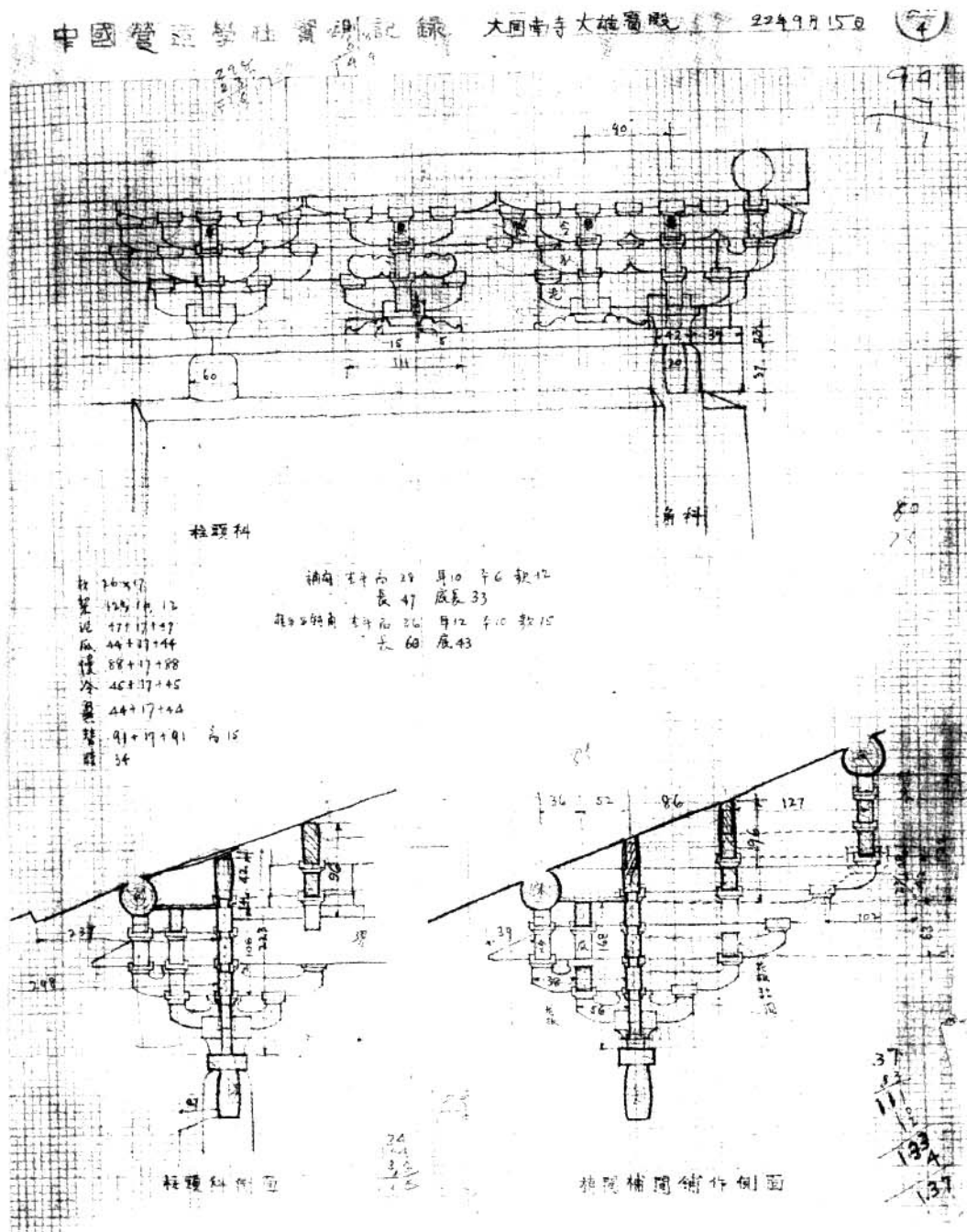


图 1 大同南寺大雄宝殿(1933年9月15日)

梁先生对于古建筑的制图要求也十分严格。

莫宗江教授十几岁就跟随梁先生学习古建筑知识和参加测绘、制图工作。莫先生曾回忆，梁先生有一次拿出几本当时被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古建筑著作，指着书上的图对他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先生生前经常对我们说：“梁先生当时就培养我们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

针对中国古建筑屋顶大、出檐深、起伏多等与西方古建筑不同的造型特点，梁先生在参照世界各国对古建筑制图不同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采用不同粗细线表现古建筑立面的制图方法，使在只有两度空间的立面图上得以表现出三度空间的立体感，大大提高了立面图的表现力。

1932年，梁先生对蓟县独乐寺进行了调研。他对这座古寺的山门与观音阁作了测绘，查阅史料、抄录碑记，访问了老者。按总论、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保护等几个部分进行整理，对它们从外观、平面、台基、柱子、斗拱、梁架到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与装饰各部分都作了论述与分析，绘制了外形、结构和细部的图纸，摄制了大量照片。这是梁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调查报告，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成果，它超过了当时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的高标准基础(图3)。

1937年梁先生与林徽因、莫宗江先生在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大殿，凭梁先生当时对古建筑型制特征的掌握，可以判断佛光寺大殿的建造年代，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必须以获得可靠的文字资料为准。于是费尽艰辛，勘察到了大殿脊梁下的题字，证实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确凿时间。从现场回来后，梁先生又从有关古籍中追查唐代有多位法师曾去佛光寺出家、主持法事和建阁造殿的事迹，从而更进一步论证了大殿的年代与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先生、刘敦桢先生与营造学社的几位同仁由北京到达云南和四川，当时研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端困难，经费无着，设备不全。但是即使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仍然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在破旧祠堂里，在小油灯下制图与写作。在这期间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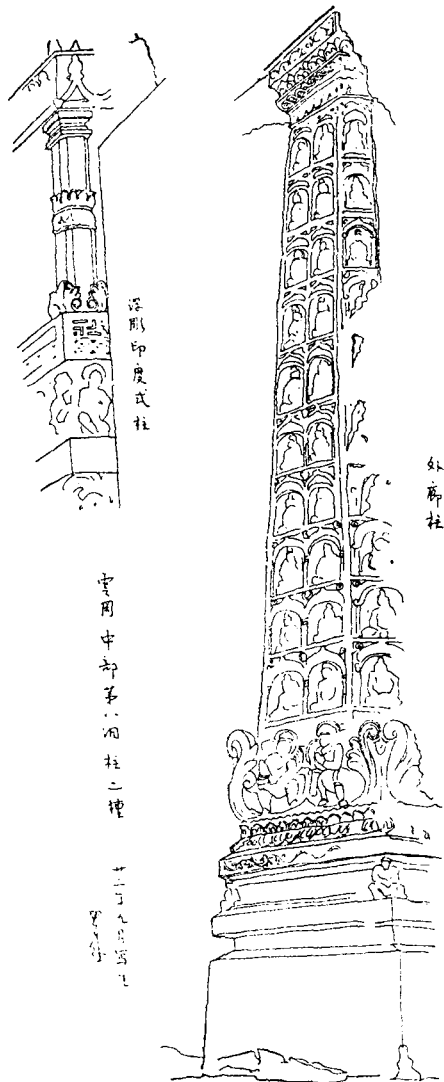


图2 大同云岗石窟洞柱(193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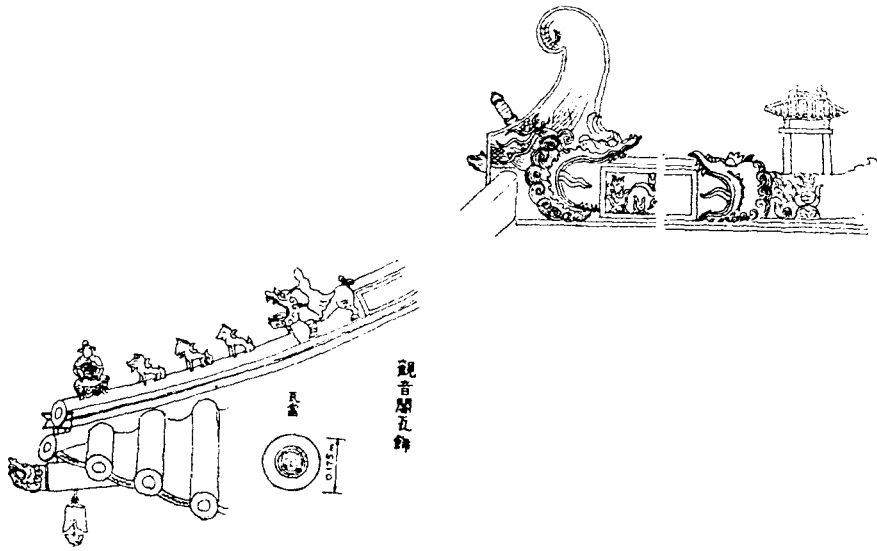


图3 独乐寺观音阁瓦饰(1932年)

继续出版发行了两期学术汇刊。在四川的乡镇,缺乏铅印条件,只好用手抄文字,在石印机上印刷;不能用照片,只能用手绘图形来代替照片。最后用毛边纸,靠大家动手一页一页地折叠装订才得以出版。但这两期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所绘制的图纸却仍然是高水平的(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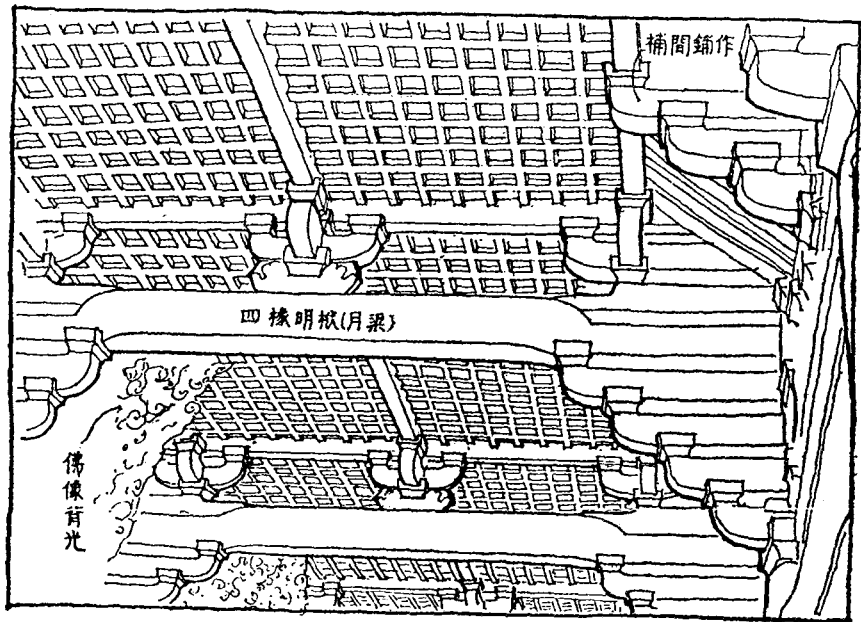


图4 佛光寺构架图

1940年以后,梁先生在已获得大量古建筑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才开始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工作。他对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结构形态都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研究,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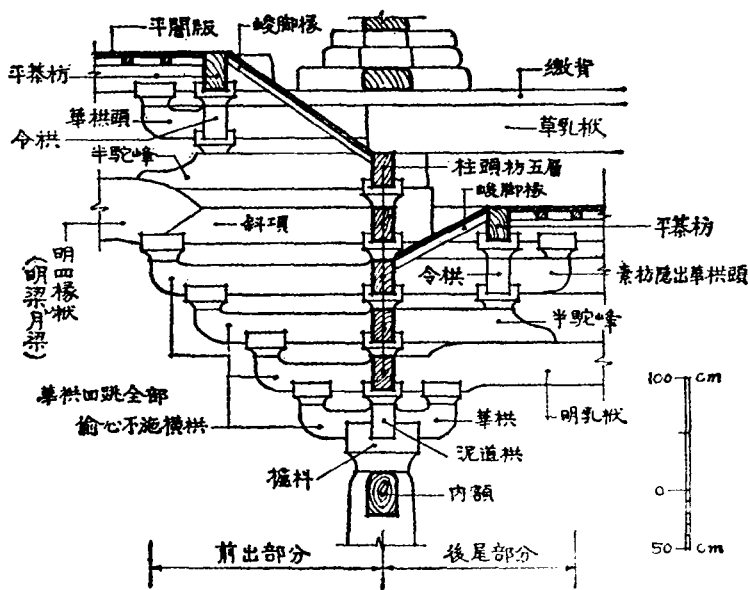


图5 佛光寺斗栱图

中寻找它们的发展脉络与规律。他对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所特有的斗栱构件进行了系统的观察排比,从而寻求出各个时期斗栱型制的特点。他对已调查的佛塔进行归纳比较,从而获得中国佛塔在型制上的分类。

1944年,梁先生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撰写,1946年他应邀去美国讲学,这是第一次中国人自己将民族的建筑文化瑰宝展示于国际学术界,获得极大的荣誉。

1954年高等学校还没有中国建筑史的教材,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建议出版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但梁先生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10年来,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中已经有不少新的发现与认识,所以只同意印少量油印本作为参考资料。

1925年的时候,梁先生的父亲梁启超得到宋朝颁行的《营造法式》重刊版本后,立即带交给在美国学习的梁先生和林徽因,希望他们能好好研究。梁先生说,当时看《营造法式》就如同读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只是在后来的古建筑调查中,才一步一步地弄懂了宋代建筑的形制与术语。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梁先生在1940年前后才开始对《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对版本文字进行校勘,用现代制图法绘制一些图纸(图6)。这项工作中间停顿了一个时期,到1961年又开始,至1963年完成“卷上”(即石作、大木作部分),但梁先生认为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充分体现了他治学的高标准的要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0年,梁先生领导建筑系的教师设计共和国的国徽。

梁先生认为国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国徽必须庄严,不能像风景画,也不能像商标。当这个庄严而又富有民族风格的国徽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后,梁先生又推荐雕塑家高庄教授担任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与定型工作。高先生为了使国徽的形象更庄严、更明朗、更富有民族气魄与时代精神,请求在定型中对原设计作一些修改,梁先生又坚决予以支持,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更为完满的国徽形象。

1951年,梁先生卧病在床,看到将被采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不尽满意,于是在

病床上上书北京市长,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成为纪念碑采用的形式。当时他要莫宗江先生绘制一张纪念碑的效果图,为了表现纪念碑在蓝天背景下的庄严形象,莫先生对天空渲染了七遍才达到要求。

几十年过去,当我们看到营造学社留下的研究报告和一张又一张古建筑的图纸,看到悬挂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上庄严的国徽,看到耸立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有这些成果和形象都充分反映了梁先生的严谨学风和精品意识。

二

梁先生这种严谨学风和精品意识也同样始终贯彻在他的办学和教学工作之中。

梁先生多次为学生和青年教师讲授建筑历史课程。他学贯中西,在讲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时经常对比西方古建筑的历史,并且随手在黑板上准确地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从比较中使我们更加形象地认识中国古建筑的特征。

他要求我们教建筑历史的教师不但要记住中外重要古建筑的形象,而且也要记住它们建造的年代和时代背景。他告诉我们,有一次在某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讲到北京城时当场问在座的梁先生,北京故宫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梁先生立即回答:“始建于明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完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梁先生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教历史教师的基本功,必须要做到。

当我到建筑历史组担任教师后,曾经又自学了一遍西方古代建筑史。梁先生要求每学一章都要将这个时期的重要建筑照着照片摹画一遍。梁先生在美国学建筑史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当时的一张张用细钢笔画的古建筑作业至今还保存着(图7)。经过这样的学习,确实使我进一步地认识了西方古建筑文化的精髓,认识了古代石头建筑所特有的雕刻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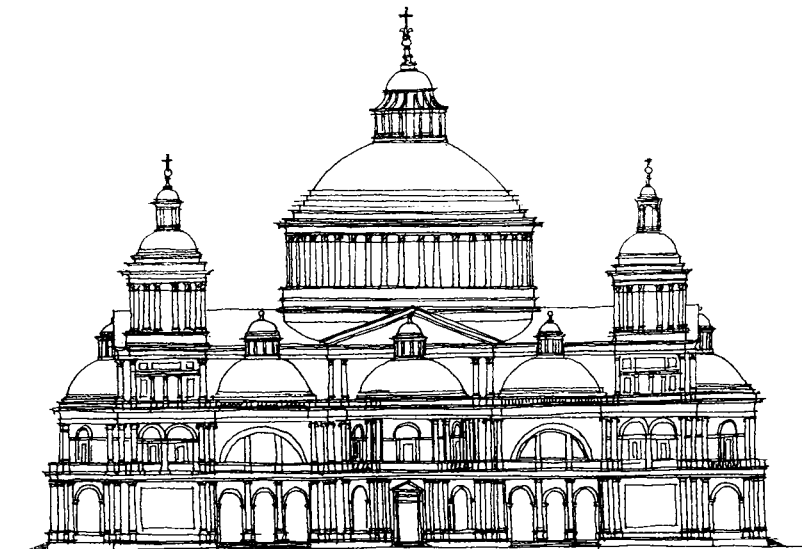


图7 梁先生在美国学建筑史时所绘钢笔画古建筑作业

1954年,我参加梁先生领导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组工作,主要担负绘制插图与拍摄照片。在收集秦汉时期有关建筑的形象资料时,有不少汉墓出土的漆器,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一方面向我讲解这些漆器上花饰纹样所表现的内容和民族风格,同时还要求我在黑纸上摹画这些云纹、龙纹,让我从摹画中去领会中国古代装饰纹样那种奔放飘逸和气韵生动的民族风格。在收集明代家具资料时,梁先生要求我们不但要看而且还要用手抚摸这些家具,摸它们的各个面,摸它们的边沿和棱角,从而能够认识到明代家具不但总体造型简洁美观,而且在竖向线条、边沿线脚等局部都有细致的处理。

对拍摄照片,梁先生也要求很严格,记得有一次拍摄颐和园的谐趣园,梁先生正好因病住在谐趣园内的瞩新楼疗养过一段时间,对于谐趣园很熟悉。对于我拍的一套照片,他认为尽管很清楚,但是还没有把这座园中之园的意境表现出来。他说,谐趣园是清乾隆皇帝要造园者模仿无锡寄畅园而建造的一座小园,它既是皇家园林又具有南方私家园林风格,所以照片应该表现出这种特殊的意境。当时拍的都是黑白照片,要表现出这种意境确非易事。所以一幅照片往往要拍摄多次、数次进暗房反复放大制作,才能达到要求。

梁先生除了讲授建筑史外,还喜欢教低年级的设计基础课,他特别强调学生的基础要学好。

当时建筑系是六年制,基本制图和建筑设计初步有两年的课程,为了让学生在制图上打下扎实的功底,他要求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要画出样图作为学生的示范。他对于这些示范图要求十分严格,往往亲自指导和检查,有时还拿着放大镜检查我们图上的每一个细部。两线垂直相交,既不能有缺口,也不能线端超出,如果是粗线,不但要相交而且在相交处要形成锐角。他要求我们凭眼睛就要能觉察一条线水平或者垂直是否有1毫米的误差。

记得周维权老师当年画的是一张中国古建筑局部的黑白水墨渲染图,完全用黑、白、灰的不同深浅,表现出砖、瓦、琉璃、石料、木料以及彩画装饰的不同质感与色彩。我画的是山西太原晋祠的圣母殿立面图,也是黑白渲染。为了表现斗栱的立体感,在斗栱的每一个面上都要画出由深到浅的变化。我们都几乎是画了一个假期才完成。

梁先生说:“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如果示范作品水平不高,要求不严,如何培养得出高质量的学生。”所以梁先生要求在系里陈列出的作品都要有高质量,不但内容好,而且包括展出的环境、展品的布置都要高水平。那时时常有外国元首和贵宾来系里参观,梁先生每次都早早来到系里,对所有展品都一一检查,有时手中还拿着一个鸡毛掸子,把展柜和墙上的灰尘都仔细打扫干净。

梁先生最反对建筑系一些师生表现出来的所谓“艺术家”的邋遢作风,如绘图桌上乱放笔墨,教室满地纸张,个人衣冠不整。他要求我们每次画完图,桌上都必须整理干净,室内打扫整洁。他说要让我们的学生学习和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环境里、一个具有精品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培养高质量人才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

梁先生这种严谨学风与精品意识当然并非天生就有的。

首先,这种学风与意识的养成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

梁先生从小在日本和北京上小学，除了在学校受教育外，在家里还接受他父亲梁启超的教育。他回忆童年在家里，常在晚饭后，兄弟姐妹们都要围坐在小圆桌前，听父亲讲古代故事和文化。1915年梁先生进清华学堂，系统地接受完全由外国教师教授的西方文化，在学习期间就与同学吴文藻、徐宗瀚等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翻译成中文。那时梁启超正在清华任教，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共称清华的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担心儿子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弃了国学，所以每当假期，他专门为子女讲课，讲授《国学源流》、《孟子》、《墨子》等。

1923年梁先生因遭车祸左腿骨折、脊椎受伤，住在协和医院治疗，就在这住院养伤的两个月里，梁启超也向他布置了学习任务，在给梁先生的信中说：“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各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句，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可见梁先生在青年时代对国学就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1924年梁先生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该校既有很强的师资，又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梁先生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努力学习，经常到图书馆、博物馆阅读和参观各国图书资料与文物。1928年在回国的途中，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先去欧洲游览，先后到北欧的瑞典、挪威，然后到西欧的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历时半年，饱览了西方著名的古代城堡与建筑。这些记载着西方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石头史书使他们从理性到感性上认识了西方古代文明，事隔数十年后，他们每当回忆起这次游历中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所以从梁先生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学的、所见的几乎都是中、西文化中的精品。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这样来概括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所受的教育：

“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严谨学风与精品意识也是与梁先生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分不开的。

梁先生诞生的20世纪之初，正是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之时，他从小在日本的华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美国求学时，他见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的文物珍宝，他看到西方许多国家的古代建筑文化都有了长时期的研究和众多的著作，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却都是外国人所写，他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研究自己的建筑史，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正是这一种强烈的爱国之心激励他和他的同事们时时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抗日战争时期，梁先生与林徽因逃难到四川宜宾的一个小镇上，少量的经费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只得依靠变卖自己的衣物维持生活。林徽因先生长年卧病在床，梁先生自己也是身患脊椎炎，后来依靠金属背心支撑着上身工作，真是国难当头、贫病交加。当时，美国曾有多所大学和博物馆邀请梁先生去美国访问讲学并给林先生治病，但梁先生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就在这种物质与生活条件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状况下，梁先生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同时还完成了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图像建筑史》。

在这本专门为外国读者撰写的建筑史中，梁先生与莫先生绘制了 50 余张图，完全用线条表现了中国古代从宫殿、寺庙、陵墓到民居各种类型建筑的平面、剖面、立面和透视，从文字到图像完全达到了世界水平。这部著作直至 1984 年才在美国出版，受到美国一些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赏。

费正清说：“他以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这因为他们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梁先生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过许多中国和外国古代精典建筑、许多著名石窟中的雕塑作品和出土的各类珍贵文物，所以他对古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及工艺品都有很高的鉴赏力。

尽管他见多识广，看过许多国内外的精品，但是梁先生认为的精品却并不局限在古代的宫殿、教堂、寺庙的领域里，精品并不都出在帝王的宫廷和陵墓里珍藏的工艺品中，他认为民间的、不见经传的建筑和工艺品中也都不乏精品存在。

1932 年梁先生与林徽因先生在北京郊区考察，在八大处与香山之间的一处山路口，他们发现山坡上有三座不大的石佛龕，由方石板建造，造型简洁，大约是金代遗物。他们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写道：“这三座石龕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这三座小龕，虽不能说是真正的建筑遗物，也可以说是与建筑有关的小品。不止诗意画意都很充足，‘建筑意’更是丰富。”由此，他们说：“建筑审美可不能势利的。大名喧赫，尤其是有乾隆御笔碑石来赞扬的，并不一定就是宝贝；不见经传，湮没在人迹罕到的乱草中间的，更不一定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以貌取人或者不可，‘以貌取建’却是个好态度。”

在梁先生家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他父亲梁启超亲笔写的一幅横幅，上面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十个大字，这也许成了梁先生对艺术美追求的标准。就在这横幅下面的沙发上铺着几块民间的蓝印花布，在书架上陈放着一只不大的陶猪。对我们这些建筑系的老学生来讲，都不止一次地听梁先生讲述这两件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小陶猪是一件一般汉代墓中的明器，它造型简练，没有什么精雕细刻却表现出小猪的神态，在工匠手里，笨拙的猪也变得雅拙可爱了。一块蓝印花布，只有蓝白二色，上面的花纹源于天然花草又不拘泥于自然花草的形态，纹样自然而有序，构图疏落有致，梁先生从分析中使我们认识到中国造型艺术既重形更重神，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传统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有时在民间艺术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和精彩。

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29 年了。我们建筑历史组对每一年来组进行毕业论文的学生都要讲一次梁先生的事迹，每当把当年梁先生和营建学社先生们所画的测绘稿、图纸展示出来时，学生们都很惊叹。当然，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前几年，用惯了针管笔画图的学生根本不知道鸭嘴笔是什么样子，这几年改用计算机制图，原来的针管笔也闲置不用了。测绘、制图的工具可以不断地改革进步，但是任何器物都是由人来掌握的，所以严谨的学风仍旧需要坚持，用计算机画出来的图要求应该更精确而美观，更应该出精品。我们这样做，主观上是

想把这种严谨学风和精品意识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20多年来,由梁先生、刘敦桢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中国建筑历史科学已经获得很大的进步,无论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成就,文物建筑保护事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深入人心。改革开放给广大建筑工作者开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尤其是建筑设计和施工,无论在类型和数量上都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对于建筑教育、科学研究和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梁先生所倡导并始终不渝所坚持的严谨学风和精品意识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记梁思成先生创办中国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经过

张驭寰

敬爱的导师梁思成先生，已离开我们 29 个寒暑了。2001 年正值梁先生百岁华诞，令我们倍感深切地怀念梁先生，使我回忆起梁先生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经过。

1956 年春夏之交，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集中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前来北京，讨论、制订长远科学规划。

当时，郭沫若院长提出应当研究中国建筑史，应当在中国科学院内办一所中国建筑史研究室。在旧中国之时，有朱启铃先生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我们新中国建立了，也应当对中国古建筑、中国建筑史进行研究，整理研究中华民族的建筑遗产。

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先生，副主任茅以升先生、第二副主任赵飞克同志也一致同意，并在学部几次会议上都进行了讨论，决定聘请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兼任拟创办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室”的主任。

经与梁先生商量，梁先生马上答应，同意创办且兼任主任。梁先生提出要大学生五名、绘图员十名，由中国科学院选派。

我当时在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工作，正在报考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生。带材料与梁先生晤面，梁先生看过材料后对我说：“我的意见你不必报考了，我想办法把你调过来（指调入中国科学院）。我正在创办中国建筑史研究室，没有人协助，你来之后，边研究，边跑腿……。”后来经严济慈主任批准，一个月之后我即调到中国科学院并在技术科学部报到。后来具体编制在土木建筑研究所（简称土建所）。

学部接待我后，给我开介绍信到清华大学校办公室，由王曼绮同志接谈。她给梁先生打过电话，我便到梁先生家中晤面。

梁先生说：“今天我总算把你调过来了，欢迎！”

清华大学给我在七公寓安排了宿舍。就这样，我开始在清华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室上班。

1956 年秋，10 月 15 日，在梁先生家书房大客厅里召开“中国建筑史研究室”成立大会，研究室全体人员参加。

梁先生主持大会，宣布“中国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室”成立，与清华大学合办，经费由中国科学院开支。

主任由梁思成先生兼任，副主任由刘致平先生（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研究

室秘书由楼庆西同志(建筑系教师支部书记)兼任。

兼任研究人员有赵正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明达(文化部文物局)、罗哲文(文化部文物局)、张驭寰(中科院土建所)、杨鸿勋(中科院土建所)、王世仁(中科院土建所)、傅熹年(中科院土建所)、虞黎鸿(中科院土建所)、林北钟(国家建委)等。

关于研究室的名称,梁先生讲话时指出,应当改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初步准备1957年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同时对颐和园建筑全面展开研究。

从这时开始,我即协助梁先生办事务,经常到中国科学院财务组、技术科学部联络工作。

就在这一段时间,国家建委派组织处崔处长来谈,他们要办建筑方面的14个研究所,其中有建筑历史研究所。他们要与我们这个“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联合,作为国家建委的研究所之一,可派绘图员,往清华送桌椅等等。梁先生同意先合一段,看看情况。

几天后,《光明日报》记者吴君尹同志来采访。1956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成立——计划在明年编著“中国建筑史”并对颐和园建筑进行全面研究》为题发表了有关消息(见图1)。

关于研究室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梁先生说:“你们到山西看看古代建筑上的大斗拱。”后来做了计划,于1956年深秋之季赴山西、陕西考察,研究室的刘致平、张驭寰、杨鸿勋、傅熹年、王世仁五人参加。傅熹年、虞黎鸿开始协助梁先生做近百年建筑的资料收集工作。

山西考察归来之后,重新制订了1957年的研究室计划,共计六大项:

1. 中国近百年建筑调研,由梁思成、傅熹年、虞黎鸿(现在巴西)、舒文思(后来调离)承担;
2. 对江南园林方面考察研究,由莫宗江、杨鸿勋担任;
3. 对山西、陕西、内蒙部分地区考察,由刘致平、王世仁担任;
4. 对汉长安城、元大都调研,由赵正之、舒文思担任;
5. 吉林民间居住建筑考察,由张驭寰担任;
6. 1957年全室合作写一本书,名曰《中国建筑》;
7. 绘图工作由林北钟担任。

当年经费预算包括图书购置,购置照相设备等等,共计人民币6万元。当时购置日本おにか方盒相机数台、图书3000册。

上半年大家都外出进行考察。归来之后,一面整理资料,一面对《中国建筑》这本书开始讨论与编写。

研究室例会于每周四下午召开。到时兼职人员以及全室人员聚齐,先由梁先生讲话,然后讨论。有一个阶段专门做关于中国古代建筑之发展讲座,是为编著《中国建筑》而进行的。

最后这本书编写完成后定名为《中国建筑》。当时人们对“中国建筑”之概念,是使它当代新建筑之区别;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即是指中国古代建筑而言,是那个时代的习惯性叫法。

《中国建筑》这部书,有7500字的概述(插图21幅);图片共计175幅,其内容从原始社会半坡居住遗址开始,按历史发展为顺序,一直到清代末年瑶族的三排林。由文物出版社于1957年12月出第一版,印精装本1000册,售价每本15.90元;平装本3000册,售价每本13.50元。著者署名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